

# 學運：何去何從？



簡約而言，學運是始於、基於學生的社會運動，由學生發動並在動員期間以學生佔大多數。但到底學運的目的是甚麼？有人認為學運是「教育的過程，讓大眾受到教育」，亦有人認為是「基於學生的反抗精神，從而反抗、改變社會上的不公平」；有某些學派認為學運只是學生過渡成人階段，具備暫時性、不安的表現，也有別的認為學運體現了社會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並銳意更正。有人說學運應具備先鋒、橋樑的作用，有的認為需具備支援性質，作運動後勤。老生常談了六十多年，近年以社會問題、香港主權政制作主體的學生運動再次在香港復甦，我們必須本著近年學運行動模式和社會氛圍，深思未來學運的路向和願境，亦必需正視學運的窘境並著力改革。

## 香港學運簡史

六十年代初，文社運動的興起，導致許多中、專上學生開始走出學術的象牙塔，成立各種文學組織，相互交流，創作文學小說。及後許多左派組織相繼活躍在文社的圈子，不少相關組織都取材自香港現實問題的批評，令言論更貼近社會脈絡。另外，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的成立亦直接讓同學在實踐的層面接觸貧苦大眾，協助他們處理生活所需。

六十年代末，左派反英暴動引起「白色恐怖」，六七暴動後導致文社分子認真思考和討論社會問題，卻又因恐共恐左氣氛而令發展停滯不前。同期的一些運動，包括要求「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中文運動，以及打壓因投稿揭露、批評校方的珠海學院學生而發起的運動「珠海事件」等，均

組織了一部分學生來對不公義之事進行抗爭，並為及後所謂「學運熱潮」提供了適當的土壤。

基於西方六十年代尾的學運以及內地文革的影響，七十年代初社會的恐左恐共情緒開始消退，同時亦小量的先鋒性集團關懷社會、中國及世界大事的發展，從而讓更多專上學生得知學術範疇外的資訊，關心社會、世界問題。學界內部在中文運動、反蘇入捷、「珠海事件」等事件的參與，加上戰後新世代的成長導致學生逐漸尋找自我民族認同，七零年美日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消息便激烈地觸動學生的神經，令學生真正能擔當社會運動的先鋒角色，捍衛釣魚台主權。

保釣行動開始，香港學運正式進入「火紅年代」，學聯在整個運動中擔當重要角色，成立「保衛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團結一眾學生，參與捍衛主權運動。根據資料統計，保釣運動歷時一年三個月，大小公開示威約三十次，參加運動者在一萬五千人以上，當中大專學生曾自發多次往港督府、維園示威聚集，亦在輿論上帶起牽頭作用。

在保釣行動的時期，學界基於學生立場不同，明顯地出現了分黨分派的現象，而最主要的便是「國粹派」和「社會派」；前者著重中國政策、優先維護中國利益，後者重視改革香港社會，兩者亦同時信奉馬列社會主義，高舉「反貪污、捉葛柏」的旗幟。七三年另一學運的聚焦事件是「反貪污、捉葛柏」，當時學聯在事件早期便進行街頭簽名運動及發起一連串公開討論，強烈要求肅清當時猖獗的貪污行為。及後在多次學界發起的集會遊行中，有數十人被警方票控或通緝，足見當時學生運動之熱。最終，在全港的壓力之下，成功將貪腐警司葛柏繩之於法，並成立廉政公署肅貪。同期的「盲人事件」、「糖街事件」等都被統稱為「關社運動」，與保釣行動共同構築了學運的「高潮期」。

及後基於各派別的學生分歧以及「國粹派」取得學生的大多數支持，同時香港社會在七四七五年面對經濟危機，因此以學生作為先鋒的社會運動較少。直至七六、七七年，中國政局大動，「四五運動」、四人幫、毛澤東倒台，步入「後毛澤東時代」，香港的國粹派學運力量消磨，整個風潮開始步入寒冬，被人稱為學「低潮期」。七八年「金禧事件」引致大學生廣泛參與，扶助當時的金禧中學學

四、一七兩大示威



中大學生在辦基校園內示威，(1971年4月17日)

近年學聯從低谷陰霾中闖了出來，帶著理想、高舉學運旗幟，在社會中積極地表達學生聲音。數十年學運的歷史中，不少學生、社運人士、學者都糾結一個思索學運本質的問題：甚麼是學運？

# 學運：可去可從？



生；七九年「艇戶事件」、「安樂村事件」學生被捕判刑而使學運被窒息，一整個十多的學運「大循環」正式告終，新一代學生面臨著圍繞著另一重點的學運世代。

八零年代後學運的火紅退卻，焦點從放眼社國的情懷，轉移構建著更香港的視野，思考著回歸和主權問題。「八十年代正值港人前途談判，中英雙方角力，一方面學生恐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負面事實，同時不甘繼續在殖民政府下淪為二等公民，學運可謂陷入兩難。當時的學生曾經有千人撰寫立場書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其後生出影響整個八十年代的「民主回歸」。「八九民運」更徹底改變了港人和學生對中國的立場，同時生出港人對民主的渴求，成為學運、港人的歷史印記。」（我們這一代學運的開始，學聯秘書長 陳樹暉）

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同樣是學運沈寂的一段光陰，承接著八九民運的沉重打擊，討論大多集中主權移交及香港未來，許多原有的關社情懷、抗爭導向的運動都漸少出現。

主權移交後，一九九九年和二千年，學聯關注香港人於中國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問題，並舉行多次活動反對香港政府提請人大釋法，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就有關問題的判決。學聯於二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遊行，警察使用胡椒噴霧暴力清場行動，後來更拘捕包括學聯成員在內的一批參與遊行的人士，引起新一波的修改公安條例的運動。同年，學聯進行反對大專分科收費的行動，部分學聯成員因四月的反對分科收費遊行而被拘捕，政府隨後宣布擱置分科收費的計劃。

經歷以上反抗後，至零三年起學聯從不缺席任何一年的七一遊行。至此，在不同的社會運動之中，我們都能夠看見學生的身影。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五區公投、反對替補機制、反對教育商品化、支援碼頭工潮、8,000人反國教大罷課、響應和平佔中、舉辦學界商討日……許多耳熟能詳的抗爭行動在近年此起彼落，恍惚讓大家感受到學生積極的抗爭能量重回香港，亦引領大家更細心思索未來學運的路向，該何去何從。

## 學運的模式

「學生針對社會上不公平和不正義的事物進行揭露批判，繼而組織起來將他們的理想付諸實踐，這就是學生運動。」學生擁有特殊的優勢，他們沒有既定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其他人士的顧慮，例如家庭、工作等，同時知識水平、對社會問題的觸覺也可能較高，因此學運在社會運動上通常佔一積極的地位。由香港的學運歷史可見，每階段的學運均有不同的重點和方向——六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國粹派著重身份認同、與中國的接軌、建設中國，八九十年代焦點放在回歸和香港的未來問題上。千禧年後，學運重點再次回歸本土社會議題，同時亦極力推動香港的民主政制，但如何更好地扣連「目標、行動、群眾、效果」，讓我們的想法能感染更多人？我們該如何處理行動的方式？提升抗爭層次到哪一個地步？如何與更多學生接觸並動員？如何建立更具規模的論述，喚醒更多置身事外的人？現代學運面臨著甚麼規限？我們需要更明確的學運綱領嗎？

學運，歸根究底，只是一小撮人的離地活動嗎？

## 學運的未來： 追求理想、建立精神、喚醒大眾、不斷進步

近年重新塑造的學聯學運招牌，在筆者的學校，的確讓學生會專注外務的形象深入人心，達致重振「社運風」的效果。來年是香港緊急存亡之秋，學聯精神，我們必需以每間學校作為宣傳本位，繼續推動學生參與社會事務，重燃港人自治的希望，對抗中共政權，維護弱勢社群的利益。未來學聯的抗爭目標明確，但道路還是要我們確認，該如何走下一步，走向哪。路，是人走出來的；學聯的道路和精神靈魂也是靠我們每人一步走出來的。

以下摘取了一些文章來引導及拓展更多更深的資料，亦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尋找更多相關的資訊，供大家分析。

參考資料：

陳樹暉：〈我們這一代學運的開始〉

《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遠東事務評論社編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著